

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外二種)

陳寅恪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河北教育出版社

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外二種)

陳寅恪 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外二種/陳寅恪著. -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1

(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

ISBN 7-5434-4896-3

I. 隋… II. 陳… III. 政治制度-研究-中國-隋唐時代 IV. D69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42266 號

版次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第一版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	八五〇×一一六八毫米 三十二開
印字數	四九一千字
印張	二十一·八七五
定價	二十八元五角
印刷	河北天潤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石家莊市開發區海河道二十九號)
出版發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莊市友誼北大街三百三十號)
裝幀設計	慈立群
責任編輯	張惠芝
作者	陳寅恪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外二種)	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

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

學術顧問

鄧廣銘 周一良

學術委員

(以姓氏筆畫為序)

田餘慶 蘇雙碧 李學勤 苑書義

彭明 漆俠 戴逸 瞿林東

編纂工作委員會

主任 瞿林東 甄樹聲

副主任 楊汝戩 張惠芝 秦進才

委員 瞿林東 張惠芝 秦進才 徐勇

張越 周文玖

◎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



香港期間留影
一九四〇年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外二種）



陳寅恪手寫清稿「唐代政治史略稿」（後易名爲「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書名頁
一九四一年



錢裝本「元白詩箋證稿」扉頁

禮記

禮記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寫清稿正文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出版說明

二十世紀是中國史學發展最顯著、變革最深刻的時期。新時代、新史觀、新史料、新方法、新的學術文化氛圍等等，造就了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學。

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大家輩出，學派林立，名著累累，異彩紛呈，在中國史學發展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現在的中國史學和未來的中國史學都得力於並將繼續得力於先賢的這些努力，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產生和發展，代表了中國史學發展的前進方向。

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是中國歷史學家研究成果在學術文化上的一個重要的反映，成為時代的宏偉紀錄；同時，它又反作用於前者，在促進社會變革與革命、增強愛國主義、加強民族團結、推動社會進步、提高民族素質、增益人們智慧等方面，一直發揮着積極的作用。

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是二十世紀世界史學的一個重要部分。如果說二十世紀的外國史學對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學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的話，那麼，近幾十年來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史學也在逐步擴大它對外國史學發展的影響。這種雙向的交流和影響，必將有利於推動世界史學的進一步發展。

在世紀之交，編輯、出版《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是對百年史學名著的整理和總結，是尊重它們在史學上的成就和史學史上的地位，也是為後人學習、研究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優秀遺產提供方便，是學術文化積累的基礎工程。同時，這個工程也為外國學者進一步了解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提供方便。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套書也可看作是向世界展示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一個學術長廊。

本社有志於從事這一尊重前人、裨益今人、嘉惠後人的文化出版工程。目的是推動中國史學事業的繁榮和發展、促進中外史學交流。我們在史學界諸多專家學者的支持下，決定編輯、出版《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這一工程繁重浩大，工作煩瑣，限於我們的識見和能力，舛誤紕繆在所難免，敬祈方家和廣大讀者不吝指正。

陳寅恪先生的史學名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依據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〇〇一年四月北京第一版印製。

陳寅恪（一八九〇——一九六九），江西修水人。早年留學日本及歐美，先後就讀於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和美國哈佛大學。一九二五年受聘清華學校研究院導師，回國

任教。後任清華大學中文、歷史系合聘教授，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第一組主任及故宮博物院理事等，其後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後挈全家離北平南行，先後任教於西南聯合大學、香港大學、廣西大學和燕京大學。一九三九年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通訊院士。一九四二年後為教育部聘任教授。一九四六年回清華大學任教。一九四八年南遷廣州，任嶺南大學教授，一九五二年後為中山大學教授。一九五五年後并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

河北教育出版社

二〇〇二年五月

出版說明

三

編校凡例

一、編選範圍。《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編選二十世紀出版的、對當時史學發展或對其後史學發展產生過重大作用和重大影響，即在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發展上佔有重要地位者。專著、論集，一視同仁；名著、名篇，皆所珍惜。範圍既廣，其工甚巨，故先期編選部分已辭世的史學家的名著。

二、版本與編次。盡量選擇好的底本，即作者的修訂本或校閱本，精心編校，自成一卷。每卷冠有作者照片、小傳、書影、手迹等。書首有總序，繼之為目錄、前言、正文，正文後或有附錄，書末以作者著述要目為殿。原著按舊式提行分段者，改為現在通行的分段形式。獨立成段的引文變換字體縮格排印。原著用文末註者，改為頁下腳註；雙行夾註改為單行小字夾註；夾註首尾原用括號者，一般刪去括號；註文自成單元。

三、編校原則。除版式與必要的技術性處理外，原著的內容及結構，一仍其舊，以存文本原貌。

四、規範用字。改異體字為正體字，改繁體字為簡化字，原則上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一九八六年十月十日重新發表的《簡化字總表》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國家教育委員會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發布的《現代漢語通用字表》為準。凡屬繁體字與簡化字一對一者，均用簡化字，如趙與趙、興與興等；如系多對一者或多音多義字，則根據情況區別對待，如乾、幹與干等。對於姓名、地名、書名等專用名詞，如用正體字、簡化字容易產生歧義者，則保留原來的文字形體，如文徵明不改為文证明，鄂縣不改為戶縣，《淮南子·汜論訓》不改為《淮南子·泛論訓》等。通假字、古今字、省形字等均保留原貌。每個時代都有其獨特語言，每個作者都有其慣用字詞，凡有根據者則不改為現在通行的字詞。

五、標點符號。凡豎排、無標點或用舊式句讀者，除個別有特殊要求者或限於目前的技術條件無法排印者外，一律改為橫排、新式標點。標點符號的使用，以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標點符號用法》為準。原著有專名（如人名、地名等）號者，均予省略；如專名號所標為並列關係且非集合詞語者，其間加頓號以便區別。書名號一律用規範形式（《》、《》，外文書名排斜體），原著無書名號或書名號不規範、不完整者，一律補加或改正。

六、校改錯訛。原著多為流傳已久的名著，對其文字一般不作改動。但確屬錯訛者，在所當改；一般筆畫之誤，魯魚淆舛，顯係誤寫錯排者，徑改不出校記。前人引書，常有省略約減或個別詞語的更動，

只要不失原意，則不以所引書改動引文。確需校改增刪之處，用尖括號（^）括住的字詞，表示刪去；用方括號〔 〕括住的字詞，表示改正；用六角括號（∩）括住的字詞，表示增補。對校改增刪者，一般加圈碼右上角註號（①、②、③……），並在同頁腳註中說明校改增刪理由及根據，其後用「校者註」字樣與原著註釋加以區分。

七、殘缺處理。原著中因字迹模糊或紙頁殘缺而致無法辨認，又無其他版本可據以核査者，根據所缺字數用「□」表示；所缺字數無法確定者，用「（下缺）」表示。

八、數字用法。一般保留原著的用法。如同一部書或同一卷書數字用法不一致時，一律用漢字表示。

總序

戴逸

二十世紀即將過去，二十一世紀即將到來。回顧過去一個世紀的中國歷史學，它經歷了曲折崎嶇的路程，也取得了偉大豐厚的成績。這一百年內產生了不少傑出的歷史學家，像王國維、梁啟超、陳垣、陳寅恪、胡適、顧頡剛、錢穆、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等等，這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情況。傑出的歷史學家，一百年出不了幾個。兩千多年前出現了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司馬遷死後一百多年，產生了班固；班固死後五十多年產生了荀悅；又過了八十多年產生了陳壽。十一世紀產生了歐陽修和司馬光及其助手劉恕、劉放與范祖禹，十二世紀產生了鄭樵。十八世紀歷史學家比較多，像

趙翼、錢大昕、王鳴盛、全祖望、章學誠，等等。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家就更多了，代表作也比較多。最重要的是二十世紀前期完成了傳統史學向近代史學的過渡。同時，二十世紀發現的史料大大促進了本世紀史學的發展，這也是過去所沒有的。漢代在孔壁里發現了《古文尚書》，西晉時在戰國魏墓中發現了《竹書紀年》，這在學術史上均可大書特書。但在古代，這種重大發現數量不算多，時間間隔也很長。二十世紀史料的發現是過去任何時代不能相比的，是大批的、連續的、重大的發現；從古到今都有，極爲豐富。一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發現了甲骨文，還有金文即鐘鼎文（金石文字從宋以後已有不少發現），產生了王國維、羅振玉、李濟、郭沫若、董作賓、胡厚宣等一大批研究專家。如果沒有甲骨文、金文的發現，他們的成績就不會那麼大。二是帛書和簡牘的發現。長沙馬王堆帛書和山東臨沂、湖北雲夢、甘肅居延等地簡牘的出土，對先秦史和秦漢史研究具有重大意義，由此產生了勞幹等研究專家。三是敦煌文書的發現，促進了魏晉南北朝、隋唐以及宋、西夏歷史研究的深入，豐富了中國歷史的內容，產生出陳寅恪、常書鴻、唐長孺等一大批學者。四是外文材料以及少數民族文字如蒙古文、滿文史料的發掘利用，擴大了中國歷史學的研究範圍，產生出陳垣、馮承鈞、韓儒林、向達等一批蒙元史、中外交通史以及世界史研究專家。五是明清檔案的開放使用。這部分材料極其豐富，有上千萬件，有的一件材料就能裝一汽車，管理這批檔案的工作人員就多達二百人；研究專家則有孟森、鄭天挺、王鍾翰等。有的學者非常重視史料，例如傅斯年說史料就是史學。這個說法不一定很合適，但是強調史料的重要，也有它的合理性。有的專家窮年累月，勞精費神，一輩子搞史料，這也是對史學的貢獻，不能因爲他專搞史料，

就說他不是史學家。史料研究是關係到歷史學盛衰的非常重要的問題。

回顧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可以概括出它的三個主要特點。

第一，進化史觀的引進。這是二十世紀歷史學的顯著標誌。自從嚴復翻譯了《天演論》，社會進化學說風靡全中國，中國近代學術均奉之為主臬。在此以前的史學，可以劃到傳統史學裏去。二十世紀初，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新史學》，夏曾佑著《中國古代史》，提出「史界革命」，顯然是受到西方的影響，提倡以進化史觀為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中國傳統史學有一種影響很大的歷史觀念，認為社會歷史越古越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中國的道統，他們所處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新史學」顯然不同，主張歷史是進步的。今文學派和康有為的思想中已經有進化史觀的因素，但更明確地提出系統的進化觀點的則是梁啟超。他認為不進行史界革命，中國就沒有出路。他說：「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新史學·中國之舊史》）以後的歷史學家，包括王國維、陳寅恪、陳垣、胡適、傅斯年等人，都具有進化史觀。進化史觀不但認為歷史是進步的，同時還強調歷史的因果關係。梁啟超就曾經反復強調過這一點。五四運動對傳統的批判，是建立在進化史觀基礎之上的。顧頡剛提出「層累地造成古史」觀，實際上是進化史觀走到極端的產物。他提出了疑古辨偽思想，認為上古時代不僅不是進步的，而且儒家宣揚的那種黃金時代，歷史上根本不存在。當時懷疑古書，否定古史的風氣非常盛行。這種疑古觀念有它的片面性，但在廓清古史迷霧方面，它是有貢獻的。古代確實有很多傳說的東西，不可深信，但也不可完全丟棄，傳說中包含着歷史真實的顆粒。顧頡剛等通過辨偽祛